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

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探析

吴晓荣¹

【摘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系统的、正规的理论学习与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始于苏区。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健全理论学习组织与管理体制，在学习内容、方式以及方法等方面进行制度设置，初步系统地进行了思想理论建设实践。通过苏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全党的理论学习意识得到强化，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初步形成了党的理论学习制度，为此后党内理论学习与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参照体系。

【关键词】苏区 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 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20) 07—0143—11

苏区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加强全党理论的武装当作党的基本任务”^{[1](P2784)}，在全党范围内初步开展系统的、正规的理论学习与教育，为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打下了制度基础。目前学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教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延安时期，对苏区时期的理论学习关注不多，且多侧重于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及其经验总结的角度阐述，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的制度设置及建设实践尚缺乏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此，本文拟对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行初步探讨，着重梳理其制度建设，并附以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以获得历史的智慧与启示。

一、苏区理论学习教育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党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工作。但是，在苏区革命前，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党内尚未能开展系统正规的理论教育。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行革命策略转变，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在于党内“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不能及时的正确的了解环境与策略的转变，不能及时的改进其领导力量的本质以及在群众中的指导工作方法”，并认为这是党的根本缺点，为此提出，“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2](P616)}此后，这一要求也始终成为苏区党的目标和要求。

红四军出击赣南后，在接受中央宣传工作方针的基础上，根据革命实际提出了更为具体、可行的宣传工作要求和理论学习教育的任务。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将能否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和肃清党内各种偏向视为能否健全并扩大红军、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的前提条件。

决议案还强调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把“党内教育问题”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强调“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P94)}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在肯定党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践探索研究”(20ZDA003)。

作者简介：吴晓荣，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江西南昌 330077)

内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基础上，对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的方法、途径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对这一时期红军和地方党的宣传以及党内理论学习教育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共产国际的指导层面而言，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政治与组织领导，其理论取向和理论阐释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根据苏联经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要加强理论教育和干部培养。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且有增无减，党内“右”倾和“左”倾的形势严峻，党的组织情形“完全不能满意”等现象，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信，强调一是要“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二是要“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信中还特别注明可以通过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方式来进行教育。^{[4] (P540)}

5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精神。^{[5] (P126-144)}同年7月9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争取广大群众，必须坚决执行的15项政治任务，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纲宣传，特别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等，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4] (P571-573)}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学习过程中，部分领导人教条式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将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这也充分说明科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

此外，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苏维埃建设，也客观要求有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党员干部。而此时共产党经过发展虽人数激增，但理论修养、实践能力普遍偏低，出现革命形势需要与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实践能力不足的矛盾，引起中共的关注与重视。关于干部缺乏需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派干部的地方报告非常多见，中央也意识到“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的缺乏”所形成的“干部恐慌现象”，强调加紧培养可以巩固党的领导的积极干部，将他们团结于各级党的周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

为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临时中央政府将开展理论学习教育提高到党员干部工作是否尽责、能否完成使命的高度来看待，命令“每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都应当加紧学习，尽量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如果“故意忽视学习的工作，敷衍了事者，则以怠工论”。^[6]如此严格且强势的规定，势必使全党上下对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建立理论学习教育组织与管理体制

党的组织和领导管理体制的建立，是苏区开展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组织保障。理论学习作为党内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由各级宣传部负责。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宣传部在“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方面的职责有五个方面，主要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组织党员政治讨论、研究革命斗争经验与教训、建立各级训练班培养人才以及加紧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

为实现这一工作职责，在机构设置上，强调宣传工作是各级党部的基本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宣传部，计划指导本级以及下一级党部宣传教育工作。支部也单设一个宣传干事。以中央宣传部来说，它内设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5] (P270-273)}

理论学习教育的主体是各类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培养由组织部负责。组织部主要通过开设各种训练班教育干部。中央组织局于1933年8月10日专门下发《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以指示信形式对党内教育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规定，对党内教育的任务，各级训练班的开设及要求、内容安排以及上课方式逐一进行了详细规定。

同时，指示信也指出，这一教育计划的执行，中央局宣传部当供给各项科目的教授大纲及几种主要的小册子。训练班内部工作方法宣传部另行指示。有各种训练班的各级党部必须将训练班的教育计划及相关情况报宣传部。^{[1] (P2745-2747)} 这充分显示了组织部和宣传部通力合作，又分工明确地对党员干部开展理论学习教育。

如何将理论学习教育政策、指令和要求落实到位，使教育计划变为现实，保证理论学习教育的效果，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建立与完善对学习过程、效果的监督、管理与保障制度，是强化党内理论学习制度执行力的关键。当时主要有监督检查制度、巡视制度和教材保障制度。

对于理论学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效果，各级党部都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如在干部培训学校，会不定期开展理论测试或者检查自学的笔记，尤其在培训结束时都会开展结课测验与总结。闽浙赣省要求各级党部根据宣传部的测验大纲，认识军事、政治的重要，主张根据测验大纲去进行学习。

例如，在测验政治方面，“可用漫谈会的方式，每人须按照测验的题目发表意见。测验委员会可按照其发表的意见是否正确、清楚、完备等，以定优劣”^{[7] (P440-441)}。在支部流动训练班上，支部教育干事要经常检查流动班的工作，每次上课后马上召集教员与正副班长，检查“教课方法有无缺点，怎样纠正，有无不按时教的？不按时来听课的有多少？正副班长管理好不好？党员进步如何”等情况，并把结果报告给区委宣传科。而区委宣传科要经常派人到各乡去实际地检查训练班的工作。每个训练科目讲完后，还要举行测验，从实际工作与记性两方面来测验，每科测验的成绩要公布，并奖励好成绩。每期训练班结束时，区委宣传科还要召集流动训练班教育委员会开一次总结会，并将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推广到其他训练班。^[8]

苏区建立巡视制度，派出巡视员深入各地，检查各项工作开展和党的组织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巡视支部，察看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教育工作情况。1932年，中共赣东北省委专门巡视葛源小组工作，先后两次参加小组会议进行巡视。巡视中发现葛源小组存在诸多错误和缺点，如：政治水平线低，对党的基本观念了解模糊，开会方式老旧，支部小组会能正常开但工作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支部小组在群众中不能起领导作用，等等。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和缺点发生，则是“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下层的实际工作所致”，为此提出今后整顿、加强的具体方针，如：要转变开会方式，开会的时间要短，每次开会不能超过三个小时，报告的时间不可过长，等等。^{[9] (P515-520)}

教材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也是理论学习教育的首要一步。苏区强调各级上级党部和机构要注意对下级党部供给训练材料。为规范管理学习教材，苏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成立出版发行机构，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各类培训班教材，并采取主动、积极的发行与推广策略，给理论学习建设以有力的教材保障。

例如，在出版机构方面有中央出版局、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等，其职责是指导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他革命理论以及党的基本政策著作。在发行机构方面，除中央及各级省委成立的发行机构外，有些报刊自身也成立专门机构来推进发行。如《青年实话》就设立了发行所、优售处和分销处等机构，并设置到各省各县各区乃至各乡，方便就近购买，以及整顿发行环节，理顺发行。

除建立健全发行的组织系统外，各级党组织还对发行工作进行具体的检查督导，以督促各地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保证发行工作的顺利开展。1931年中央发行科就曾专门就发行工作致信江苏省委^{[10] (P375-376)}，信中一一指出江苏省委发行工作所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缺点及弱点，强调发行工作是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部门”，要求与忽视发行工作的错误观念作坚决斗争，健全发行组织系统，扩大新的发行线索，改良发行技术，并扩大发行范围，以扩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同时提升党员干部及工农群众的思想水平。

闽浙赣苏区的《工农读本》，从教材的编写到印刷发行，较好地呈现了苏区理论学习教材的保障体系。《工农读本》一共4册，共120课，近2万字，课文的体裁多样，有诗歌、散文、问答、短剧、游记等形式，其主要内容除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

识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生产、卫生、体育、破除迷信等内容，内容由简入难，既联系实际，又通俗易懂，革命性与实用性相融合，又突显时代性。读本第1册由黄道编辑，赣东北省苏印刷局印刷，赣东北省苏及各县苏文化委员会发行。

后3册均由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辑股编辑，闽浙赣省苏文化部审查股审查，闽浙赣省苏文化部刻印局印刷，由闽浙赣省各级文化部发行。^{[11](P748-788)}得益于完备的编写、印刷和发行保障体系，这一套教材成为赣东北苏区文化程度不高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保障。

除保障教材外，各类教员的供应也是开展理论学习教育的前提条件。为培养各类教员，教育部创办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等各类师范学校，并开设小学教员、干部学校、流动训练班等各类教员训练班，保证教育干部和教员的供给。如高级师范学校的目标，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方法和苏维埃新的教育方法，来“培养目前实际上急需的初级及短期师范学校教员、训练班教员及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高级干部”^{[12](P1533)}。

三、规范理论学习教育内容

苏区时期，党内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形势、党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心工作等，最终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完成革命目标。各级党部尤其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相关文件、通知及指示信，编印的各类学习材料，报刊等，都可以是学习的材料。因党员干部的不同文化状况和理论知识水平差异，理论学习内容也非千篇一律。为保证学习效果，尤其强调针对性，针对不同的党员和不同的训练机构，学习的内容有所不同，即使同样的内容在难易程度上也进行了区分。

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工农党员，他们如果只凭借个人的文化根底，是无法独立进行理论学习的，这就要求在教授其基本读写知识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基本理论知识教育。在苏区理论教育学习教材中，有大量识字读写的基础内容。在一些识字班中，还会规定具体的学习内容。

1934年7月26日，教育部编审局编印的一则《夜校识字班教材和宣传材料》，是一封落款为“桂兰的女儿”的信件，是她在校听了拥护五大纲领准备对日宣战后写给妈妈的信。这封信大约500个字，信中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迫害，主张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境内驱逐出去，解放全中国的民众，为此呼吁家中的妈妈要积极参与动员，完成各项动员计划。这份材料通知要求各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在20天的时间内（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深浅，时间可延长缩短），让学生明白信的内容，认识信中生字，更要求俱乐部根据信的内容，举行问答晚会、化妆演讲等。

材料后还附有《反日五大纲领的内容》，以问答说明的形式，解释了什么是反帝五大纲领、日本占领了中国哪些地方、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什么不同日本打仗、中国同日本打仗胜利的可能以及如何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问题，在提高学生文化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学生教授基本的政治常识，提升其思想觉悟。^{[11](P790-792)}

此外，结合扫盲班、夜校、识字班活动，苏区还会组织或开办读报活动，以各类报刊为教材，让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负责宣读、解释与讨论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让学员们通过听的方式获得大量的时局信息，推动他们文化素养与思想水平的提升，并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如国家政治保卫队训练班、读报班读了《红星》第57期上的“抗日先遣队进福州”和“瑞金红属代表大会给红军电”后，经过热烈讨论，训练班同志一致决定要学习瑞金红属模范，支持借谷运动，缴纳土地税，还要家人做草鞋慰劳红军，这是读报活动的积极效果。^[13]

对于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且掌握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水平的党员干部，主要是对其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教育。中央教育部编审局编印的《苏维埃政权》^{[11](P837-842)}就是供这一类党员干部学习使用的。该教材分为4章，对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性质、苏维埃目前的十大政纲、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及职能、行政区划划分的标准进行了较完备的说明，不仅有助于党员干部从理

论层面理解苏维埃，还便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践行苏维埃建设。

中共鄂东北特委开办的党务干部学校，1929年5月前已开办2期，学员主要是“县委以下有工作观念、能识字者”，其学习的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的ABC、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共产党的组织与纪律、中国农村社会之分析、农民问题、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民众组织的方式和运动、斗争和暴动、宣传和煽动、开会和游行、游击战争等。^{[14](P38)}

新入党的党员理论学习教育，除了分配具体工作接受实际工作训练之外，主要是通过短期的新党员训练班的学习教育，让他们能够快速“了解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常识”^{[15](P2050)}。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为开展党员教育而编写的《党员须知》读本，内容就包括共产党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共产党目前所面临的任务，以及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党的基本组织、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以及入党条件等。^{[16](P3063)}可以说，这种因材施教方式，保证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都可以通过理论学习教育切实提高自身理论水平，进而提高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除党员理论水平不同外，不同的学习平台和机构类型，学习的内容也存在差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研究团体，主要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其要研究讨论的科目主要有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国党史与列宁主义。

省委训练班培养的是县一级干部、省委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以及区一级主要干部，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以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尤其注重如何进行苏维埃建设，其主要科目为政治常识（即共产国际纲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剩下还留有时间去实习，以及进行其他合作者运动、地方武装中的政治与训练工作，等等。县委流动训练班培养区委支部及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与主要支部书记，更强调如何开展基层工作，主要科目为党员须知的解释、区委应该怎样领导支部、支部应该怎样做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几个基本工作、怎样在地方武装中工作、工会工作，也注重实习。

支部流动训练班主要是利用党员空暇时间（如晚上），受时间限制，所学习的内容强调简短易懂，便于理解接受，所学习的科目主要有党员须知、支部工作、查田工作、扩大红军、经济建设、党与苏维埃、工会工作。如果党和苏维埃有重要决议或某种动员，这些决议和决定也是训练班学习的内容。^{[1](P2745-2747)}

就算在同一层级的学习平台，学习内容根据革命形势与对象也稍有不同，强调结合革命实际安排学习内容。1930年鄂豫边特委举办的党务训练班中，选择支部或区委中较有能力的同志加以短期训练，训练教材主要有，中共六大会议决议及中央政治决议、组织问题及群众工作等。^{[17](P143)}同年中共六安县委先后召开两次训练班，第一次专训练六区，学习内容有政治、农运、工运、妇女、宣传、士兵、青运等，学习材料主要是各类中央的决议案。第二次是训练各区支部，此时恰逢党内出现托派分子企图分裂党的行为，授课教材除与第一次相同外，还增加了针对机会主义与反对派的内容。^{[14](P300-301)}

四、拓宽理论学习教育阵地

除学习内容因材施教外，针对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学习途径上，苏区也开创了多种方式。一系列不同层次、各种类型的干部培训学校的创办，党报党刊及研究机构的建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培养成批革命所需人才队伍的平台。

（一）开办党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开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各类地方干部学校、短期训练班、支部流动训练班，以及各类专业性学校。这些学校和训练班是进行理论学习教育的主阵地和平台。

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学校设有三种训练班：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政府、工会工作训练班，以及高级训练班。学习期限依次为2、4、6个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从各地抽调。第1期从瑞金县委就抽调了7名干部到学校进行学习。^{[18](P47)}曾经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习的肖锋，后来回顾他在校的学习经历时提到，学校第1期共125名学员，其中高级班35人，全部都是来自苏区红军团以上、地方团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不超过18岁。经过4个月的学习，肖锋自我感觉“打开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大门”^{[19](P395-400)}。

各级地方党部也纷纷创办地方党校，以加强干部培养和理论水平的提升。赣东北于1931年7月创办党校，由涂振农任校长。第1期毕业后能担任工作的学员，县常委1个，区委7个(1个区书)，苏区50个，白区发展工作的8个，红军和游击队的6个，其他负责区的共青团、工会、妇女、赤[卫]队的工作的24个。第2期学员选调县委区委，至少是支书，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与知识水平^{[9](P403)}，到次年11月，党校“已办七期。两个月一期，每期有学生60名以上。有短期秘密工作训练班十二期，两个礼拜一期”^{[7](P188)}。

除党校外，各地特别注重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因为短期训练班比较灵活，在革命环境中容易实施，因而成为党内进行理论学习教育的一种普遍形式。训练班一般按系统、分层次开办。根据瑞金县委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8月，瑞金全县共有训练班202个，共训练10112人，除满足本地区工作需要外，培养和调动干部到红军地方政治训练班的有51人，抽调到红军学校的11人，抽调到其他地方工作的13人。^{[18](P77, P88)}石城县委在1932年10月至12月的冲锋工作中，也开办了一次党员训练班(8天)，学生共有45名，提拔了12个干部到工作开展较差的区域做巡视工作，经过教育，这些人能按期到各支部和群众中去指示和检阅工作。^{[18](P448)}

对于流动训练班，1933年10月，中央组织局规定，流动训练班以小组为单位，人数至多不超过20人，少则七八人，新老党员都可以参加，选出一名班长管理工作。训练班每个课程顶多6次上完，最少2次上完，每次最多2小时，上课以晚上为好，地点则选受训练者住地的中心。

在开班前，找好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为教员，根据并按照省委或县宣传部依照中央组织部对于教员计划指示信内所规定的课程所拟出的教授大纲来培训教员，在教授方法上则采用讨论回答式。对于上课方式，指示信比较详细具体地指出，在回答时，如果学员回答错了，“第一，不要问他。第二，等这一同志讲完了，问其他的同志‘他说的对不对？’等其他同志来批评”，然后教员再来解释。还进一步指出，不要以某个同志说错了，打击他，这样他下次就怕发言了。^{[1](P2927-2928)}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各方面蓬勃发展。革命对具备较高理论素质的干部需求很大。为“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办训练班的基础上，1933年9月，苏维埃大学正式开学(1934年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苏维埃大学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班，后又增加外交、粮食等班^{[19](P290)}，以在职干部为主，共招生1500多名，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原单位工作。1934年由于形势变化，苏维埃大学合并到中央党校。

(二) 创办党报、党刊

各级党组织创办的报刊，尤其是中央级的党报党刊，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15](P1578)}，极大地满足了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教育的需要，从而加强和巩固了理论学习教育的基本阵地和平台。

据学者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四五年间，仅在现江西境内的苏维埃区域内(含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共出版报刊203种，省级报刊84种，特委一级报刊26种，中心县委一级报刊7种，县级报刊20种。^{[20](P6)}其中尤以《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的影响最为突出。

据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称，截止到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 34 种，其中《红色中华》发行 4 万份，《青年实话》发行 2.8 万份，《斗争》发行 2.71 万份，《红星》发行 1.73 万份。^{[21] (P330)} 以《红色中华》为例，它于 1931 年 12 月创刊，初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成为党、团、政府和工会的联合机关报，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苏区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该报作为涵盖面较广的综合性报纸，因其权威且具有指导性、内容丰富、贴近苏区实际和百姓生活、容易购买获得等诸多优势，成为各级党组织进行理论学习教育的教材，更是理论学习的基本平台，进而活跃、丰富了苏区理论学习途径。

当然，报刊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与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有关领导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李立三就曾提出“党报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22] (P127)}，张闻天也反复强调党内的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与党的指导者，阅读党报，给党报做文章是他们的实际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强调，谁如若不这样做，谁就是忽视了他的任务，就是口头上说要党的工作转变，而实际上对这种工作的转变是持消极态度的。^{[23] (P148)}

其他层级的报刊也同样起到了区域内理论学习平台作用。《湘赣红旗》为中共湘赣省委机关报，1931 年 10 月中共湘赣省委成立后即创刊。1931 年 12 月 30 日第 3 期上，湘赣省委以《本报启事》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写成文章投稿，并且发动其他工农群众参加该报的通讯；二是用党报代替各类通知，所以要求各级党组织详细阅读《湘赣红旗》，将该报上发表的一切指示，详细讨论执行，并且当做支部与小组会讨论的材料。^{[20] (P70)} 在赣东北，信江特委出版的《红旗周刊》，每期 10000 余小册，在信江群众中取得很大反响，收效甚众。^{[9] (P72)} 总之，借助党报党刊，苏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途径和载体更加丰富，通过读报、讨论等方式，理论学习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进而推动了理论学习教育的深入发展。

（三）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学术团体是共产党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苏维埃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4] (P115)}。1933 年 4 月 9 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为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研究会会员的资格及入会程序都较为简单，规定只要能够独立看懂《红色中华》或《青年实话》的党团员、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类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愿意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且有时间保障，通过一位会员推荐便可成为正式成员。^{[19] (P368-369)} 此后，苏区各地各级机关及红军机关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之分会，有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33 年 6 月 18 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宣告成立，成立初活动安排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大致相同，并确定 7 月 2 日召开第一次讨论会。^[25]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组织讲演、座谈、翻译、编书等多种途径，有力地带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传播及理论建设。一方面，它们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 1934 年先后翻印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研究提纲（第一种）》《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它们开展学术研究，组织讲演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33 年 4 月至 1934 年 7 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了 20 次以上的学术演讲活动。如 1933 年 4 月 16 日的第一次学术讲演，由唐开元（刘少奇）讲解《劳动法》。博古和张闻天也先后多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讲演过，如张闻天就讲演过《广州公社》和《战争与青年》。

讨论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主要的学习和研究方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研究的步骤如下：每 10 天开一次会，理事会提交大纲或参考材料后，由会员推定或由小组长指定会员 1 人准备报告，如果采用上课的方式，必须事先决定讲授者。为保证较好的学习研究效果，还规定在上课或讨论之前，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大纲预先思考研究。报告人简单报告后，开展讨论，最后由报告人做总结，理事会负责指导讨论。每次讨论的时间视人数和问题的性质而定，但不超过 2 小时。^{[19] (P368-369)} 不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仅在中央苏区成立并开展活动，在其他苏区都没有建立起来，其作用和影响力也就仅限于中央苏区。

五、创新理论学习教育方法

除上述教育平台建设外，苏区还从理论学习方法方式入手，制定并探索出一系列提高学习教育效果的具体措施。各种会议、书面报告、支部训练、启发讨论式学习以及个别谈话等方法的推广和完善，尤其是支部训练和启发讨论式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学习效率；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际工作中加强理论学习，则进一步保证了理论学习的效果。

（一）严密的支部训练

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各级党组织开始意识到支部的作用，强调通过支部训练来强化党员学习教育。1933年8月19日，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如何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给苏区各级党部发出指示信，强调除建立有系统的培训班来进行教育外，还需要从日常支部生活去教育同志。指示信还要求各级党部专门讨论这封信，决定具体办法去改善支部工作，讨论结果还需要报告组织局。

[1] (P2784-2788)

支部主要通过组织各种问题讨论会、研究会、识字班和读报班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1931年9月通过的《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凡属每次中央和省委的重要决议和指示，必须动员全党用各种会议方式来讨论，一直深入支部和小组会的讨论，每个同志都必须热烈发言与参加讨论，并要将讨论结果，作成简单决议案报告上级党部”；“实行各级委员会以及支部和小组会的工作检查，发展同志自下的自我批评，指出过去工作错误缺点经验教训，同时，在这一切会议和自我批评中，务要联系和加紧对同志的阶级教育及共产主义教育，打破同志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以及封建亲族感情关系等错误观念”；“要在支部下组织读报小组，责成识字同志经常按期讲解党报及苏维埃和机关报等刊物的内容给不识字的同志及革命群众听”。^{[9] (P304-305)}这些规定既详细具体，又比较切合赣东北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实际，执行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通过丰富的支部生活，党员干部在了解党的政策、路线、方针过程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二）启发讨论式学习

在苏区的理论学习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各类学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各类训练班，都强调启发讨论式学习方法，通过讨论来加深对理论的学习与理解，以期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古田会议决议》在提出党内18种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士兵政治训练的8种方法，如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说话、个别谈话、新兵及俘虏兵特别教育等。其中政治课又设置了10大教授方法，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强调复习、准备提纲、讨论式。^{[3] (P104)}这10种教授法强调要注重讨论启发，而不是灌输，为确保讨论效果要提前准备提纲，讨论后要注重复习，讲授讨论时要注意说话表达方式，注重贴近普通党员群众的接受水平。此后，这10种教授法，成为苏区和军队党内教育的主要方法。

如前所述，支部生活主张通过讨论会来提高党员认识。各级党组织会制定好讨论主题和提纲供支部讨论，确保讨论效果。据一份载于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印发的第20号通讯的“学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支部讨论大纲”记载，该次讨论会主要讨论四中全会以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当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针对讨论的内容设有三个部分的讨论题目供讨论，如“目前世界革命形势有什么特点”“党在苏区最大的成绩是哪些？党在苏区最弱点是在哪些地方”“苏区的党目前的任务有哪些”。^{[16] (P3206-3207)}

（三）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学习和研究所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理论学习和教育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在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反对“离开工作作专门式的学院式的研究”，也反对“专门干工作完全放弃学习的事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6] (P1-11)}，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深入调查研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1931年11月上旬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要将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既要“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15] (P1846)}各级党部还强调党员干部要拓宽自己的学习领域和学习对象，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为此，1933年6月，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各级教育部新调来的干部训练问题》的第3号训令中，提出了4种训练干部的办法：“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用行政纪律来教育”“开办短期的训练班”，并且将“在工作中训练”作为教育干部的首要办法。^{[27] (P779-780)}

各类学校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不仅有课堂学习，而且要进行社会实践，深入实际进行实习。据共产主义学校第1期学员肖锋回忆，在学习了4个月后，学校安排他们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进行为期1个月的实习，学习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调研查田问题并协助边区前线的工作。实习结束后各组进行了交流总结，就查田运动中的解决工农群众生活问题展开讨论，副校长董必武听取了班级调研情况汇报并亲自总结了实习的收获。^{[19] (P399-400)}应该说，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育实效的学习方法，在理论学习教育实践中的充分运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知识的效果，增强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推动了苏区的发展巩固和苏维埃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六、小结

在苏区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较短，党内除少部分知识分子外，多是农民，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党内理论水平不高，对客观形势和阶级关系判断不够准确，加上党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外部军事战争不断，受以上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苏区时期的理论学习与教育也有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直到1933年，还有报告称短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开展不足，仍存在对新党员的训练与干部的培养做得不充分，支部中的政治讨论没有发展的情况。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深刻认识到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理论学习教育，在理论学习教育管理、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都推进制度构建，并从革命实际需求和客观条件出发进行实践，初步形成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相对完备的政策规章及监督管理体制、分类合理的学习内容、灵活多样的学习教育途径、卓有成效的学习教育方法，制度化地开展理论学习，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建成强有力的政党，进行国家治理提供了理论保障。对理论学习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领导全党开展理论学习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这一经验在后来各个时期都得到继承和发展，加强学习成为党员干部提高水平、获得知识、提升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理论学习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学习教育意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培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教育的制度雏形。无论是学习管理体制、学习内容、学习形式，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苏区党内理论学习制度和实践探索是党内理论学习制度的历史源头，为后来党内理论学习提供了制度基础，新时代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制度都可以在苏区时期找到源头。此外，苏区时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更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而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使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一步一步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 [4]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六号）——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N].红色中华，1932-03-02.
- [7]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8]怎么办支部流动训练班？[N].红色中华，1934-04-19.
- [9]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0]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 [11]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下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2]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 [13]一个读报的成绩[N].红星，1934-08-10.
- [1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5]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16]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17]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8]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934年及补遗部分[Z].北京：中央档案馆，南昌：江西省档案馆，1992.
- [19]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0]江西苏区报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2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2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23]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24]张宏卿，肖文燕.载体与路径：中央苏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6).
- [25]马克斯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成立了[N].红色中华，1933-06-29.

[2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7]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7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